



# 一切往事， 皆为序章

## 古罗马的教训表明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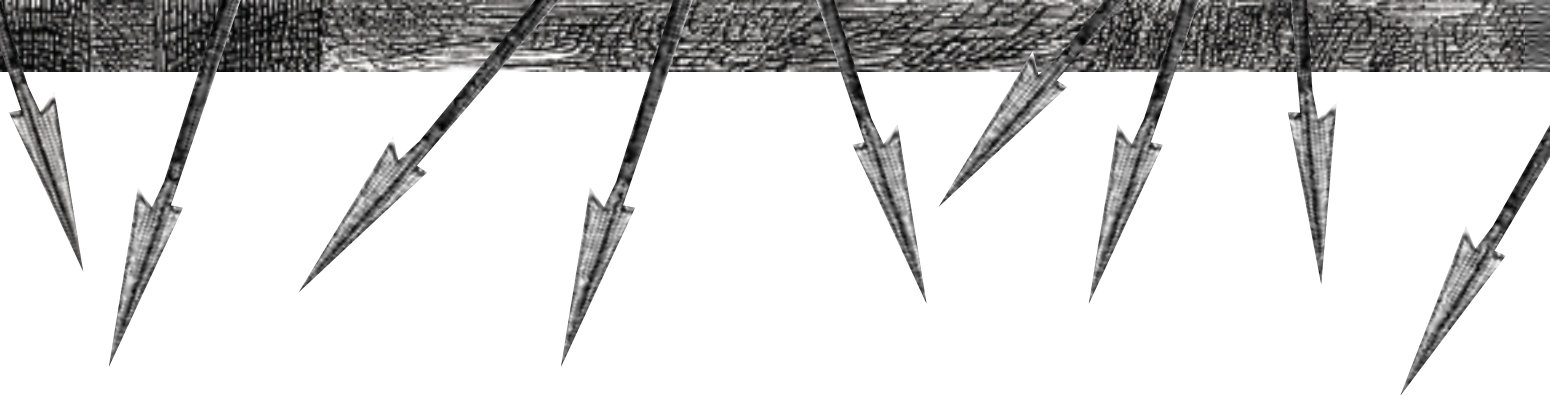
安东尼·阿内特、约翰·列普斯基

可持续发展包含这样一种观点，即物质进步必须始终与社会包容和尊重环境携手并进。与这两个支柱脱钩的经济增长将是自我破坏的行为。古罗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悲剧是如何发生以及如何避免悲剧发生的案例研究。

罗马共和国持续了500年，因为它的制度足够灵活，能够适应两大挑战——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内部冲突，以及与敌对国家的外部冲突和被征服人民的融合。尽管局势持续紧张，但罗马人仍因共同的价值观而团结一致，这种价值观是一种深根于公共服务的荣誉感以及对共同利益的承诺。

这一中心思想一直维持了几代人，直到它不再延续。起初，变化是微妙的。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共和国的版图从高卢延伸到希腊，领地的扩张为其带来了大量财富，包括进贡、新省的税收以及金属矿的开采。超级富有的罗马新阶层创造了金融工具来打包债务、转售债务，并将利润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这听起来有点耳熟吧？在诸多方面，这是一种古老的全球化形式，包括贸易和金融。到公元前1世纪，繁荣将罗马的人口推向近100万人，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达到这一里程碑的城市。





## 在罗马共和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个世纪内，一连串的领导人都打破了以前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规范。

但一切都不顺利。新财富没有被广泛分享。大量奴隶的涌入颠覆了劳动力市场，使士兵和公民失业，并且越来越愤怒。与此同时，正如爱德华·沃茨(Edward Watts)在他的新书《凡人共和国》(Mortal Republic)所指出的那样，财富积累开始取代个人美德和为国服务，成为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而精英们并不是仅仅把新获得的财富用在别墅和奢侈品上。与他们的祖先不同，这些精英进行大规模的贿赂和腐败，以确保政治荣誉和职位，以及获得司法豁免。

也许没有人比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更能展现这个时代的情况。他的财富主要来自腐败的房地产投机，数量巨大，足以与整个罗马国库相匹敌。作为数百名政治家的资助者，他从自己的财富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没过多久，断层线破裂。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精英阶层通过分享权力和重新平衡政治来回应该民众的不满。但在自身利益和腐败的影响下，共识瓦解。

同样的模式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世纪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民粹主义者的愤怒与贵族的不妥协相互碰撞，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往往以暴力的方式结束。

这个周期始于格拉古(Gracchus)兄弟俩提比略(Tiberius)和盖约(Gaius)。提比略推动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但是，他的改革计划引发了保守派的反对，最终他被殴打致死。他的弟弟盖约继承其遗志，专注于粮食补贴形式的社会保

护，并通过司法改革打击腐败。最终他也被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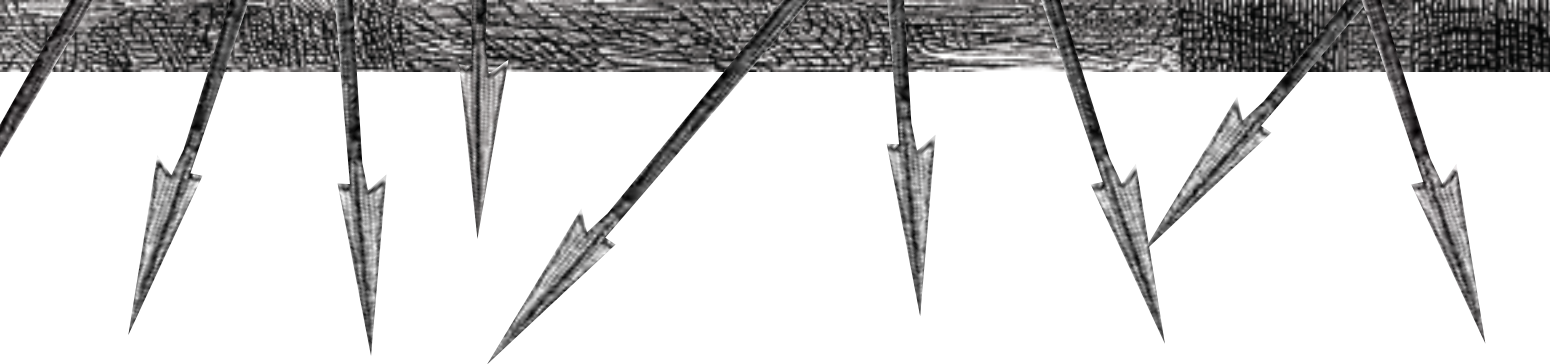
在一片混乱之后，盖乌斯·马里乌斯(Gaius Marius)成为穷人的捍卫者，掀起了一股反对参议院腐败的民众浪潮。但他最终与那些将暴力作为政治手段的人结盟，引发了贵族的强烈抵制并导致苏拉的独裁统治。苏拉做了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率领军队进入罗马市区。在他统治期内，实行大规模的禁令，没收财产，剥夺平民的权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像卡特琳(Cataline)和克洛迪斯(Clodius)这样肆无忌惮的贵族通过利用民众的挫败感，包括肆意依靠暴力和恐吓的手段来寻求发展自己的事业。

所有这些都为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铺平了道路。凯撒使用强硬手段推行民粹主义改革。但在内战胜利之后，凯撒也被冠以独裁者的称号，并变得越来越专制。他的死引发了另一轮民间杀戮，实际上摧毁了罗马共和国。

在罗马共和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个世纪内，一连串的领导人都打破了以前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规则。政治暴力成为常态。国家机构被包装成武器用以迫害反对者。暴徒越来越愤怒。反过来，强者提出要恢复秩序。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不平等和腐败所造成的。

在罗马共和国崩溃之后，罗马经历了一次伟大的复兴，尽管和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镇压民主制度来维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伟大编年史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认为，公元2世纪帝国的巅峰时刻是历史上“人类最幸福和最繁荣的”时期。

爱德华·吉本不知道的是，这一好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宜人的气候。正如凯尔·哈珀(Kyle Harper)在其著名的《罗马帝国的命运：气候、疾病与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公元前200年—公元150年如今被称为是罗马气候最适



宜的时期，温暖、湿润和可预测的气候特别有利于帝国主要农作物的生长。

但到公元3世纪时，气候变得更冷、更干燥、更难以预测，干旱和作物歉收的情况更加频繁。到公元5世纪中期，古典时代末期小冰期(Late Antique Little Ice Age)到来。

气候变化降低了帝国对包括流行病在内的各种冲击的抵御能力。公元2世纪天花爆发，随后在公元3世纪爆发了一场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致命疫情。在公元6世纪中期，查士丁尼瘟疫——第一个已知的黑死病——可能导致帝国一半的人口丧命。

近期的证据证实了气候变化的作用。在瘟疫爆发前的十年间欧洲遭遇了2000年来最寒冷的气温，这是由一系列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所造成的。这很可能迫使沙鼠和土拨鼠离开它们在中亚的自然栖息地，导致它们所带来的携带细菌的跳蚤感染了黑鼠，而这些黑鼠顺着罗马庞大的贸易路线网络激增。

可以肯定的是，罗马的灭亡有诸多原因。它可能仍然是人类历史上由最多因素决定的一个事件。但似乎越来越清楚的是，影响人类世界的自然世界是罪魁祸首。

被这些不利的自然力量削弱，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开始瓦解。这一时期政治持续不稳定，边境压力大，货币贬值导致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在公元4世纪经济真正复苏之后，自然环境再次出手——欧亚大陆的严重干旱促使匈奴人迁徙，哈珀(Harper)称他们为“马背上的气候难民”。这开启了罗马边境大规模迁徙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在公元5世纪时灭亡。紧接着，在公元6世纪时发生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作物歉收、灾难性瘟疫和毁灭性战争的恶性三重奏。正是在这个时期，罗马的人口减少到仅仅2万人，而古罗马广场也沦为牧场(campo vaccino)，即奶牛的牧地。

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都因未能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检验而衰落。这种失败是如何发生的为我们这

个时代提供了警示——历史悠久的社会规范的崩溃、由经济不平等驱动根深蒂固的政治两极分化、精英阶层对共同利益的摒弃以及导致疾病和灾难的环境破坏。

我们应将这一教训铭记于心，特别是历史以可怕且令人不安的旋律回响时。这表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紧迫性，即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确保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全球呼吁。罗马的经历为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可能面临的未来。

## 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都因未能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检验而衰落。

当然，我们的经济与古罗马经济相比有一些重要的区别。我们的经济更富裕、更健康、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罗马人没有能力消除所有形式的物质匮乏，尽管他们能够而且应该更好地处理因自身的全球化而产生的不平等。而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两点。

另外，我们也有能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气候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迄今为止面临的巨大挑战。罗马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大自然的摆布。他们的活动并不是引起气候变化的驱动力，因此他们无法减缓或阻止气候变化。但是，由于今日的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可以通过改变我们自身的行为来解决——在未来30年内建立一个零碳排放的能源系统。

最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具有持久的重要性——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公元前130年、530年，还是2030年。**FD**

---

安东尼·阿内特(ANTHONY ANNETT)是IMF信息交流部主任助理，约翰·列普斯基(JOSHUA LIPSKY)是IMF信息交流部高级信息官员。